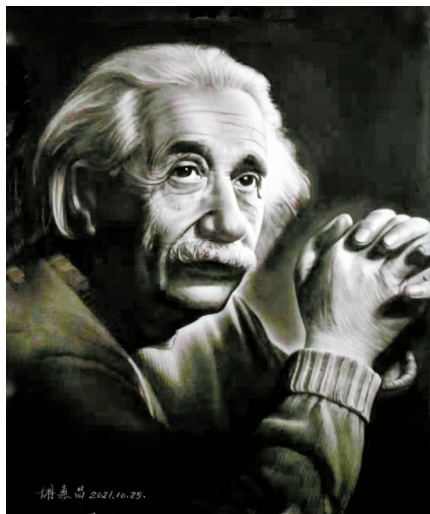




碳粉画《钱学森》



碳粉画《苏炳添》



碳粉画《爱因斯坦》

传奇「十要」

对现代戏曲的启示

周东旭



传奇，在唐宋指小说，明清时代则是对戏曲文学的一种称呼。同为戏剧，传奇又不同于杂剧。余姚人吕天成《曲品》：“杂剧北音，传奇南调；杂剧折惟四，唱惟一人；传奇折数多，唱必匀派。”无论是音乐、戏剧结构、表演形式，两者都有一定差异，明清传奇盛行时，杂剧相对衰弱了。

吕天成的《曲品》是对传奇的一部评论集，自序中说仿钟嵘《诗品》、庾肩吾《书品》、谢赫《画品》，涉及戏剧作家122人，作品226种。他在《曲品》卷下中引用了孙月峰的一段话：“凡南戏，第一要事佳；第二要关目好；第三要搬出来好；第四要按官调，协音律；第五要使人易晓；第六要词采；第七要善敷衍，淡处作得浓，闲处作得热闹；第八要各脚色分得匀妥；第九要脱套；第十要合世情，关风化。持此十要，以衡传奇，靡不当矣。”孙月峰是吕天成的舅祖，就是我们俗称的好公。

我们常说戏要好，如何好看，如何精彩，这传奇“十要”就是一个很好的标准。

第一要事佳，对故事的选题上要求故事好。选材的选择至关重要，前些年听一位老师说，现在的戏为什么不受百姓欢迎，因为许多戏的题材，并非真正取材。李渔说“非奇不传”，事奇而真，合乎情理。没有戏剧核心可以提炼的故事，写文章、报告文学则都可以，上了舞台，则不好看。

第二要关目好。关目指戏曲情节的安排和构思。同样的故事，有各种版本的演绎，为什么同一个故事有人讲出来很精彩，有人讲来则索然无味，这就是关目没排好。

第三要搬出来好。许多戏剧本很好看，但在舞台上演出则不好看，所以要考虑舞台表演。

第四要按官调，协音律。常说各剧种的差别就在于戏曲音乐、表演、服装大同小异，唯独音乐让人一听便明白是什么剧种。官调，音律，是古代填曲子必须掌握的。

第五要使人易晓。毕竟戏曲属通俗文学，李渔说，书是写给识字的人看的，戏则是写给不识字的人看的。所以要求通俗易懂。这一点，现在许多戏曲演出也做不到，没有准确定位戏曲的观众，时常听许多老年人走出剧场时说：“这搞得是什么？”白居易写诗要求“老妪能解”，许多新编戏曲故作高深，不光老妪不能解，读书人也不能解。

第六要词采，即强调文学性。关汉卿有关汉卿的风格，王实甫有王实甫的笔法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词采风格，但要在通俗浅显中出词采，也是难事一桩。

第七要善敷衍，就是要把戏做足。比如京剧《锁麟囊》有“三让椅”，故事讲述女主人公薛湘灵诉说赠囊经过，本来十分简

单，把前场的戏剧包袱解开就是。但程砚秋动了许多脑筋，采取一段一段讲述，吊足观众胃口，因为有“三让椅”，也让舞台表演更具动感。

第八要各脚色分得匀妥。旧时传统生旦净末丑，各行当都有主要的剧目，因此戏曲剧目也十分丰富，同一本戏也一样，各脚色匀妥，则大家都有戏。像越剧《五女拜寿》就是一则群戏，久演不衰，几乎每个越剧团都搬演。现在越剧，为了突出小生花旦，很少给小花脸安

排脚色，以致行当萎缩。以前常说的行当“四柱头”，小生、花旦、老生、小丑。因为丑行的缺失，导致无法搬演许多喜闻乐见的喜剧。“花脸不上台，戏文做不来”，没有小花脸的插科打诨，舞台艺术失色不少。

第九要脱套，脱套就是耍脱俗套。其实俗套有一定的规范性，套路的存在有一定道理。比如以前经常说越剧演的戏多数是“私订终身后花园，落难公子中状元”。如果英雄救美是俗套，那换成美人救英雄就可以，比如白蛇盗草救许仙。如果白马是男的没戏可讲，那么《女驸马》就有意思了。这种简单的翻一翻并不是很难，但要翻到脑洞大开，确定有一些难度。

第十要合世情，关风化。戏曲除了娱乐功能外，还有教化功能，旧时代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，而年复一年的乡村社戏，也是最好的社会教育。舞台上坏人都是恶人恶报，忠良总有贵人相救，乱臣贼子基本砍头结束。《琵琶记》的题词中说“不关风化体，纵好也枉然”，历来都十分强调教化作用。不过传奇十要，放在最后一条，意思也可以明白，不能只是“宣教”，艺术自有宣教作用，但不是广告宣传品，不然效果也会适得其反。

现在传统戏曲的困境非常多，对比传奇“十要”，多数的病症可以找到答案。



无声世界的力与美

——记胡惠昌先生

傅红兵



胡惠昌创作照（傅红兵 摄）

认识胡惠昌先生差不多有50年了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读高中时，经常去解放北路体育场玩耍，有时能看到有趣的一幕：一群聋哑人在那里训练跑步，领头的是一位个头不高、皮肤黝黑的30来岁男子。他不时比划着手语和学生交流，当他以惊人的速度给学生作示范时，就像在跑道上飞，那

一身肌肉漂亮极了。说来也巧，我与胡惠昌后来成为宁波水表厂的同事。记得第一次在食堂碰到他，我兴奋地迎上去打招呼，他却摇摇头愣在那里。我用笨拙的手势示意他：我在体育场看你跑步。他忽地明白了，笑着竖起了大拇指。当时，他在水表厂设计科工作，主要绘制大大小小的广告牌，制作产品说明书。同一单位上班，我偶尔也去他的工作室串门。他工作时全神贯注，对我的存在似乎毫无知觉。我结婚前，想在客厅挂一幅画，就向他求画。他一口答应，然后在纸条上写道：“你得请我喝喜酒。”没多久，他就交稿了，那是一幅油画，茂密的森林，弯曲的小路，浓郁的俄罗斯风格。喝喜酒那天，他又特意送我一幅国画《仕女图》。我感动于他的情义。当时他给各大报刊设计刊头，每幅给他有5元钱的稿费，这也算一笔不小收入。

随着交往深入，我慢慢了解到胡惠昌坎坷的经历。3岁那年，他因病失聪，从此步入无声世界。性格倔强的他并没有被击倒。1961年他凭借良好的绘画天分，考入上海聋哑青年技术学院美术系。正当他全力以赴苦练绘画基本功时，又

一场大病将他打回宁波。临别时，老师拉着这个颇有灵性的学生，希望他病愈后继续学业。病情稍有好转，胡惠昌索性在宁波开了一家个体画店，一方面维持生计，一方面自学绘画。开店期间，他走访各地老艺人，不断完善自己的绘画技能，油画、国画、水彩画均有涉及，但最喜欢的还是碳粉画。他的碳粉肖像画，栩栩如生，形神兼备，为他带来了不少生意。

除了画画，胡惠昌另有一项过人天赋：短跑。在1959年全省聋人运动会上，他独得3枚金牌，第二年蝉联3项冠军。胡惠昌人生一大遗憾是，未能参加1957年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第八届夏季聋人奥运会。当年未满20岁的他正摩拳擦掌欲冲击世界冠军，我国因种种原因取消了这一参赛计划。遗憾归遗憾，田径运动终究让他难以割舍。改革开放后，我国各项体育运动步入正轨，胡惠昌又钻研起人体构造理论、田径科学训练方法，并担任省、市田径教练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聋哑运动员。

1978年胡惠昌调入宁波水表厂任美术设计后，厂领导知道他心里藏着体育情结，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，尽量满足他的兴趣爱好。其间，胡惠昌在美术和体育两方面均有建树：1989年，他获得宁波市政府颁发的工艺美术师称号；1991年他随中国代表团赴香港，参加第三届国际残疾人技能竞赛，在83个国家（地区）2000多名选手中脱颖而出，夺得铜牌。2014年，“无声胜有声”——聋人胡惠昌碳粉画展，先后在鼓楼和市图书馆成功展出，作品中除了传统的人物肖像，也有一些表现速度的体育创新题材。今年他自费印制《胡惠昌碳粉画作品及碳粉画技法》一书，圆了他的一个梦——这是他作画60载的硕果。胡惠昌捧着书，

犹如怀抱新生的婴儿，一书本送到亲朋好友手里，脸上露出半是满足、半是羞涩的笑容。

俗话说：文体不分家。这个现象在胡惠昌身上得到了特别充分的体现。2009年由宁波市体育局编写的《宁波体育60年》一书，有专门章节介绍胡惠昌作为运动员、教练员的出色成绩。2011年，宁波市残联、宁波市体育局联合授予胡惠昌“突出贡献奖”，以表彰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浙江省体育事业立下的汗马功劳。之后，他又以教练员的身份，带领学生参加全国、亚太地区的聋人田径比赛，他的学生马宝宝、胡海鹤、袁迎春、

胡翘翘、汪江慧、李君等，先后获得省级以上金牌40多枚，银牌、铜牌不计其数，有5名学生共6次打破全国纪录。现在他的爱徒马宝宝已接过接力棒，成为全国第二位聋人田径教练。

胡惠昌如今已是一位82岁老人了。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，主题则为“动”与“静”两类。在健身房里，论力量训练许多小伙子不是他的对手。静就是画画，他还有许多好的构思和想法，想一一实现。作为他的老同事，笔者还想透露一个小秘密：胡惠昌有位漂亮的太太，当年就是他的模特儿。

为草木立传

范江

自神农尝百草始，中国人的生活一刻也未离开过草木，不管是喝茶还是服药，皆从草木中来。而诗经、楚辞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中对花草草的吟诵早已超越了草木本身。儿时看到外婆在天井种了许多月季、凤仙、一串红、茶梅，生在残砖断瓦搭建的花坛里，满院灿烂芬芳，而虎耳草攀爬在斑斑苔痕的瓦片墙上，又是多么的宁静幽远。后来经常徒步上班，途经公园总要为一路上的花花草草驻足，城市里的草木虽比不得深山幽谷，却也春华秋实，呈现着四

季更迭。喜欢崔白的野逸，赵佶的精到，李迪的雅致，陈淳的洒脱，徐渭的狂，醉心于朱耷的奇趣，石涛的自在，蒲华的落拓，而对钱选、恽寿平、任颐等更是心摹手追，又从潘天寿、陈之佛、林风眠、常玉、吴冠中诸先生的作品中，感悟到现代人对草木的真挚情感，他们无论用传统笔墨还是西方技法，画面中始终透露出浓浓的东方美学意境。

拿起画笔，从水彩、丙烯到彩墨、水墨，无论门派画种的界限，从册页到八尺整张，戏笔游走，无问东西，或密或疏，色墨交融，存水墨之趣又不想被笔墨所累，表达内心景象，不被具体的形象所表，在虚与实，显与隐，有限与无限的对冲中，寻求率真的诗性意境。

一门心思为花忙，用一支拙笔为草木立传。因为，世间美物太多，而拥有的时间太少。



范江水墨作品

招宝山“第一山”碑刻年代之谜

陈一鸣

招宝山是宁波甬江入海口北岸陆地的一座小山，原名候涛山，又名鳌柱山，由于它地处海口，历来国内外的商船往来频繁，商业繁荣，百舸交集，招财进宝，故称“招宝山”。招宝山与南岸金鸡山两山对峙，形成天险，海防上素有“两浙咽喉，浙东门户”之称。虽然其山高不足百米，但人文景观丰富。山上有威远城、鳌柱塔、宝陀寺，以及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多处海防工事。

进入招宝山景区，由山麓上行百步，即可见陡坡山岩上立有“第一山”石碑。碑下有一小平台，可供游人驻足。此碑高1.85米，宽1米，为招宝山景点之一。“第一山”三字，书法浑厚有力，落款为“庐陵萧荫书”，下镌石印两颗，分别为“臣天荫印”“介亭”。遗憾的是，落款没有写下具体日期，于是也就无从知晓此碑立于何时。据民国《镇海县志·金石》篇记载：此碑刻收入于明代碑刻条目中，故而认为它系明代碑刻，但具体为明代哪朝，不得而知。

抗倭名将、明代都督卢镬曾在招宝山下的潮音洞（已毁）两侧书联云：“六国来王处，平倭第一关”，用十个大字来阐明招宝山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的作用。明末清初诗人邵似雍诗咏招宝山：“莫小候涛山，东来第一关。风号连地震，潮涌啮城还。海阔奔难入，江流到此湾。蛟门天设险，领袖众峰环。”可见，高不足百米的招宝山被誉为“第一山”，自有其理。

那么“庐陵萧荫”究竟是何人呢？通过网络搜索，笔者发现明代万历《吉安府志》卷三（第45页）上有相关记载：萧天荫，庐陵县人，万历年间授试百户；《庐陵县志》卷十一（第57页）记载：萧天荫，湖波人，指挥金事。

在日本内阁文库藏万历十三年（1585年）刻本影印本《吉安府志》上，笔者还惊喜地发现了萧天荫绘制的“吉安郡治图”，此图因志图版面关系分为三幅，在第一幅郡治图下角，注有“署指挥金事萧天荫



「第一山」碑（陈一鸣摄）

写”。方志地图由一位武职官员绘制，这在古代方志中比较少见。也许可以推测，萧天荫本身是一名武职中的文官。

至此，“第一山”的碑刻时间基本可以确定，在明万历年间（1573年-1620年）。如果要再确切些，书写时间在萧天荫任指挥金事后可能性较大，毕竟萧天荫之前的百户官职太低。万历十三年（1585年），绘制“吉安郡治图”时，他是指挥金事，但府志中记载他为“授试百户”，可见他是在1585年左右升职为指挥金事的，故此，招宝山“第一山”石碑的立碑时间应该在1585年至1620年之间。

据《明史·职官志》载：“武官世官九等：指挥使及同知，金事，卫、所镇抚，正、副千户，百户，试百户。”试百户相当于见习百户，不是必设职位，比百户低一

级，从六品。萧天荫从“授试百户”到“指挥金事”，连升三级，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史料无从查考。

据《明史·兵志二》载：“天下既定，度要害地，系一郡者设所，连郡者设卫。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，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，百十有二人者为百户所。所设总旗二，小旗十，大小联比以成军。”

每卫设指挥使1人，正三品，是卫的最高统帅；指挥同知2人，从三品；指挥金事4人，正四品；卫镇抚2人，从五品。每卫通常统辖5个千户所，千户所分布在卫城周边，每个千户所军士编制1120人。每卫军士编制5600人，这个编制未包含居于卫所的军士家属，所以卫的编制可以视为5600户军户家庭。